



晁补之

□王鹏飞

晁补之(1053年—1110年),字无咎,号归来子,北宋时期济州巨野晁路口村人(今巨野县刘围子村),曾任吏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等职。晁补之年轻时师从苏轼,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工书画,能诗词,善属文。

晁氏家族从五代末迁居济州(今济宁一带),晁补之是济州一脉六世后裔。此时,晁氏家族已经发展成知名的官宦书香世家,在两百年的时间里,家族内有20多人载于史书。其父晁端友(1029年—1075年),进士及第,历任上虞、新城知县,其人品高尚,对晁补之影响很大。

晁补之少年时才气过人、卓尔不群,7岁时能文。他聪敏强记、嗜学不倦、广览博取,自幼攻读儒家经典。从少年时代起,晁补之就随父亲游历四方,曾寓居洛阳。北宋治平元年,晁补之12岁时,又随父亲迁居会稽(今浙江绍兴),此后晁补之长期在江南生活,他遍览名胜,拓展了视野。

晁补之13岁时,在常州跟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学习。王安国专注经学,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硕儒,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,很少夸学生,但是他对晁补之非常赞赏。

晁补之与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师从苏轼,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。在“苏门四学士”中,晁补之是最早拜于苏轼门下的。北宋熙宁四年,苏轼被朝廷派往杭州任通判。当时苏轼已名满天下,士大夫争相与他交往,作为一个未及第的青年人,晁补之梦寐以求拜于苏轼门下。

北宋熙宁五年春,晁补之精心撰写了一封《上苏公书》,表达了希望拜在苏轼门下的恳切心情。第一次上书未能如愿,晁补之又写了第二封《上苏公书》,苏轼看到晁补之的文笔不错,又觉得晁补之态度十分诚恳,就同意接纳他为门生。

成为“苏门四学士”后,晁补之虚心请教、勤奋学习,在苏轼的悉心指导下大有长进,晁补之创作《七述》,该文对钱塘潮的描绘极为生动。苏轼原来也想写感赋,看了晁补之的文章后,他大加称赞,说:“我可以搁笔了!”又“称其文博辩雋伟,绝人远甚,必显于世,由是知名”(《宋史·晁补之传》)。在苏轼的赞誉和推扬下,晁补之才名广为传播,加之苏轼的影响,形成了晁补之性格中豪迈的气质。

熙宁八年,晁补之父亲晁端友

病卒于京师昭德坊,他生前为官清廉家贫,死后不能按时埋葬。晁补之那年23岁,奉母归巨野故里,耕读度日。父亲去世后,晁补之失去了经济来源,加之遇到水患,生活陷入困境。

北宋元丰二年,晁补之考取进士,时年27岁,在开封府和礼部考试中均名列第一。主考官认为他的文章“近世未有”,便进呈宋神宗御览,宋神宗看了以后也称赞说:“是深于经术者,可革浮薄。”于是,晁补之被任命为澶州(今濮阳一带)司户参军。当时他的叔叔晁端仁与黄庭坚同在大名府任职,晁补之在中进士返乡途中,专程到大名府拜望叔叔和黄庭坚,从此晁补之与黄庭坚开始结交。

元丰五年,晁补之在澶州司户任职三年后,朝廷召试学官,他参加了考试。这次应试者有数百人,最后只取五人,晁补之有幸被考取,并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,后又迁为校书郎。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张耒也担任秘书省正字一职,后任著作佐郎,黄庭坚被任命为集贤校理、著作佐郎。

北宋元祐年间,苏轼弟子在京师会聚,他们在苏轼周围诗词唱和。元祐六年春,晁补之以秘阁校理通判处扬州,次年三月,苏轼任扬州知州,晁补之以诗相迎,苏轼以诗答曰:“少年独识晁新城,闭门却扫卷旆旌。胸中自有谈天口,坐却秦军发墨守。”晁补之的母亲杨氏生日时,苏轼也以诗酒相贺,苏轼在扬州写的《和陶饮酒二十首》第十九首,就说到晁补之:“晁子天麒麟,结交未及仕。高才固难及,雅志或类已,各怀伯业能,共有丘明耻”。

元祐七年十一月,晁补之被召进京,以秘书丞、著作郎任国史编修。元祐九年四月,苏轼遭贬谪,晁补之也于同年六月出任齐州知州。

到齐州后,晁补之没有消沉,而是尽力济民。在齐州任上,晁补之赈济灾民,救治数千人。当时齐州群盗在大白天抢劫,“补之默得其姓名、囊橐皆审,一日宴客,召贼曹以方略授之,酒行未竟,悉擒以来,一府为彻警。”晁补之的查访得知齐州群盗姓名,以智擒之,为齐州百姓除了害。

北宋绍圣二年正月,晁补之被降为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通判,因为他的岳父杜纯弟是应天府知州,又兼南京留守司公事,晁补之为避亲嫌,改任亳州(今安徽亳县)通判。绍圣四年,晁补之再被贬为监处州(今浙江丽水)盐酒税。他匆匆赶赴被贬之地,不料行到丹阳途中,母杨氏夫人病亡,晁补之与弟弟晁将之奉灵柩还乡,在巨野服丧。

北宋元符元年,由于老家巨野地势低洼,晁补之便移居在缗城(今金乡)。元符二年闰九月,母忧刚除,晁补之又改任监信州(今江西上饶)盐酒税。

北宋建中靖国元年,晁补之授尚书礼部员外郎、哲宗实录院检讨官、神宗国史编修官。他再三上表辞谢而求外任,不许,只得改任吏部郎中。七月,恩师苏轼病逝,晁补之悲痛万分,撰写《祭端明苏公文》,倾诉深情。

晁补之虽然屡屡遭贬、流徙不定,但他始终关心民生疾苦,没有因为自己的潦倒、失意而罔顾民意。崇宁元年九月,年过半百的晁补之再次被罢黜,返回老家闲居八年。

大观三年,晁补之被重新起用,不久授任达州知州,未赴任,就改任泗州知州。晁补之刚到任,就卒于泗州官舍,时年58岁,后来葬于巨野晁氏祖茔,同是“苏门四学士”的张耒为其撰写了铭文。

□赵瑞峰

上世纪80年代,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,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,季羡林应国内文化机构邀请,或作考察访问,或出席重要学术会议,因此有机会参观、游览一些著名的旅游景区。季羡林还记下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,使读者受益。

1985年10月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卷》编委会在烟台召开最后定稿会议。会后季羡林与朱德熙、吕叔湘、姜椿芳、周祖模等大家一起登蓬莱阁观海。

其实,就在去年同一时间,季羡林参加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卷》编委会在烟台召开的第一次词条编写审稿会后,就曾登上蓬莱阁,由于时间紧迫,只是匆匆游览,印象不深,季羡林也说,“仿佛没有进入‘角色’”。

时隔一年,季羡林又来到烟台,并再次登上蓬莱阁。这时,因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卷》已经定稿,季羡林心里颇为轻松快慰,加上能和老朋友同登蓬莱阁,因此“印象当然比去年深刻得多,自己也好像进入了‘角色’,看来非写点什么不可了”。

季羡林大赞蓬莱阁“蓬莱大名垂宇宙”,他来到蓬莱阁以前,因受“蓬莱三山”传说的影响,“总幻想这里应该是仙山缥缈、白云缭绕,仙人宫阙隐现云中,是洞天福地,蓬莱仙境,不食人间烟火。”然而来到蓬莱阁后,季羡林发现“眼前看到的却并不是这种情况。只不过是一些人间的建筑,错综地排列在一个小山头上”。



然而,季羡林对事物抱着达观的态度,他说,“(蓬莱阁)既然是在人间,当然只能看到人间的建筑。”当他以鉴赏家的眼光来看待蓬莱阁,又觉得蓬莱阁的建筑还是不错的,碧瓦红墙、崇楼峻阁,掩映于绿树丛中。

一进入嵌着“丹崖仙境”四个大字的山门,季羡林认为这算是进入了仙境。所谓“丹崖”,指的是此地多红石,另外还有四大块红石耸立在一个院子里。

“进入天后宫的那一层院子”,引起季羡林注目的,“不是天后的塑像,而是那一株古老的唐槐”。季羡林发出感慨:这棵唐槐“在这仙境里生活了已经一千多年了,虽然还没有‘霜皮溜雨四十围,黛色参天两千尺’,但是老态龙钟,却又枝叶葱茏,浑身仙风道骨,颇有一点非凡的气概了”。

对蓬莱阁的“天后海神像”,季羡林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:“此地近海,渔民天天同海打交道;大海是神秘难测的,不知道有多少渔民葬身波涛之中。他们迫不得已,只好乞灵于神道,于是就出现了天后。”然而,正如季羡林所言,“在这个端庄美丽的女神后边,不知道包含着多少血泪悲剧啊!”

季羡林继续描述道,“到了最后一层院子,才真正到了蓬莱阁,阁并不高,只有两层。过去有诗人咏道:‘登上蓬莱阁,伸手把天摸。’显然是有点夸张。但是,一登上二楼,举目北望,海天渺茫,自己也仿佛凌虚御空,相信伸手就能摸到天,觉得这两句诗绝非夸张了。谁到这里都会想到蓬莱三山的传说,也会想到刻在一个院子里两边墙上的四句话:直上蓬莱阁,人间第一楼。云山千里目,海岛四时秋。”

登上蓬莱阁,就绕不开关于八仙过海的话题,但季羡林认为这太渺茫无稽,但海市蜃楼却是真实的。季羡林从前读到、听到过海市蜃楼的情景,心中向往已久。但他知道海市蜃楼极难见到,但这并不影响使他想起曾在登州做过五天知州的诗人苏轼。苏轼写过一首诗,就叫《登州海市》。

对此,给季羡林一行做导游的小姑娘却说,其实苏轼并没有看到海市,因为他在登州的时间实在太短,而且是岁暮天寒之际,季羡林也怀疑苏轼是故弄玄虚。但是,对于治学严谨、凡事讲证据的学者来说,季羡林对苏轼诗中所写的虽有怀疑,却没有轻易否定。他说,“又焉知海市在不应该

出现的时候出现了呢?”这真是通情达理。

苏轼究竟在登州看到过海市吗?季羡林认为,“登州人民并不关心……尽管苏轼只是……待了五天,他们还是在蓬莱阁上给他立庙塑像,把他的书法刻在石头上,以垂永久”。史载,苏东坡在登州短短的五天里,还是尽其所能为当地人民做了一点好事,因此人民没有忘记他。季羡林因之感慨道:“苏轼在天有灵,当然会感到快慰吧。”

季羡林游遍蓬莱阁,不禁抚今追昔、幻想迷离。八仙的传说渺茫难稽,海市蜃楼又不能看到,这让他“心里感到莫名的空虚”。但那个潜藏在他心中的对蓬莱三山的美好想象却始终不曾离开,而且让他愿意相信“在蓬莱阁附近的某一个海中真有那么一个蓬莱三山”。